

余华 让小说里的人自己说话

文 高佳馨



余华在纪录片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中

余华
1960年出生,著名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呼喊与细雨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《文城》等,中短篇小说《活着》《现实一种》《世事如烟》等。

余华访谈 家庭成员激发 我的创作灵感

问: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写到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,您觉得当下的年轻人会从中读出共鸣吗?

余华: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所谓的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。二者其实并不对立,而是互补的。比如我上中学时,常常在球台和教室之间穿梭,动与静,并非水火不容,而是可以根据个人心境和需求灵活转换的。尽管当下的年轻人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,但成长的烦恼与迷茫却一直都在。

问:您怎么评价自己年轻时的那些先锋小说?

余华:我最近重读了自己年轻时的作品,其中有两篇小说令我满意,一篇是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另一篇是《鲜血梅花》。这两篇小说都是以“在路上”为主题,当时我才二十几岁,能够如此细腻地叙述并呈现旅途中的各种事物,我觉得我的文笔已经达到了我后来五六十岁时的水平。我现在在读以前的作品,经常感叹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章节,真不可思议,我很羡慕我那个时候的才华。

问:您的妻子、儿子会参与到您的写作中吗?

余华:在我的创作过程中,家庭成员之间的讨论总是非常热烈,这种互动激发了我的灵感,让我的作品更加完善。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虹和儿子余海果。陈虹是一位优秀的读者,总能在阅读我的初稿时,敏锐地捕捉到文中的精彩之处,发现存在的问题,并且提出中肯的建议。《文城》这个书名就叫陈虹的建议。这本书以前的书名叫《南方往事》,我不太满意,她说,改叫《文城》吧。我觉得这个书名太好了,书里所有的故事都跟它有关。最后定稿时,我“恳求”家人不要再提意见了,因为我已经修改十多遍了。

问:您的儿子余海果发表了小说处女作,还执导过电影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您期待他成为作家或者导演吗?

余华:我最早开始写作时,最大的遗憾,就是我父亲不是杂志编辑,而是一个小县城的医生。我儿子要写作,起步肯定比我年轻时容易得多,起码发表不是问题,因为我可以找关系把他的作品拿去发表。不过,作为他的父亲,对他的要求还是应该高一点,我希望他能够凭实力发表作品,不要凭父亲的关系去发表。未来的路还很长,他可能会继续写作这条路,也可能选择其他方向。他写了几篇小说,我觉得相当不错,但陈虹觉得还需要锤炼。

我一直鼓励余海果多读哲学书,这对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都有帮助。文学寻找的都是有意思的,哲学寻找的是有意义的。而且,如果他这个年龄不读哲学书,过了40岁,就永远不会读了。有了这个积累,后来也能写一些除了小说以外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,虽然写得还是像小说一样。

时隔35年,余华发表于1989年的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于近日再版发行。这是余华在文坛的成名作,也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。小说以寓言形式描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迷茫,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:只要内心强大而温暖,就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归宿。

除小说之外,该书还收录了两篇余华的创作谈,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理念和心路历程。出版方“读客文化”制作了一张宣传海报,图中余华鼻青脸肿、缠着绷带、打着石膏,手拿一本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笑容可掬。余华说,这张图与小说的主题“一定要出去闯闯,哪怕即使鼻青脸肿”非常契合。另外,余华的最新散文集《山谷微风》也已近日出版。

县城牙医 进京改稿

余华的父亲是山东人,在部队担任卫生员,转业后分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省防疫大队,负责家禽牲畜防疫,不久后调到嘉兴市海盐县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。母亲也在父亲的单位工作。余华生在杭州,长在海盐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刚好高中毕业,报名考试,第一年落榜,转年又考,还是没考上。父母安排他去念了一年卫生学校,毕业后在卫生院当牙医。余华情绪低落,感到前途渺茫。

卫生院对面是海盐县文化馆,他常看到文化馆的人在大街上晃来晃去,不用正常上下班,非常羡慕。他认识了文化馆的几个人,问他们怎样才能到文化馆工作?对方说,要有技能、特长,搞音乐、美术、文学都行,最好能发表些文章。余华想了想,决定写小说。

1980年,余华20岁,在宁波进进修拔牙,闲暇时读了两篇小说,一篇是《小说月报》上刊登的汪曾祺的《受戒》,另一篇是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》中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。这两篇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回到海盐后,他白天在卫生院拔牙,晚上回家写作。夏天全身是汗,怕把稿子弄湿,手上绑了一条干毛巾。他回忆:“写第一篇小说时,我都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,引号该怎么用。我中学写作文从没用过引号。我找了一本《人民文学》读了一下,发现写对话的时候可以用引号,描写心里想什么的时候也可以用引号。还有换段应该怎么换,也是慢慢地学。”

写了两年,余华在《西湖》杂志上发表了自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——《第一宿舍》。又过了半年,还是在《西湖》杂志上,他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威尼斯》《牙医》。随后,时任《北京文学》编委周雁如邀请他赴京修改他投稿的小说《星星》。

当时《北京文学》的主编是杨沫,副主编是王蒙。后来余华在直播中回忆那次北京之行:“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路费、住宿费谁来出?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到,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,还按照干部出差的标准提供补贴,每天给我两块。其实,就算他们不承担,我自费也愿意去,因为我从来没在大刊物上发过作品。”

海盐没有到北京的火车。余华坐长途汽车去了上海,从上海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。连硬座票都买不到,火车上人太多了,他一路从

上海站着到了北京。周雁如建议他把小说的结尾修改得光明一些。余华说:“没问题,周老师,只要给我发表,我可以从头到尾给你写得光明。”只用了一天,他便将《星星》的结尾改好了,周雁如又安排他在北京游玩了一段日子。

《星星》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1984年第一期上,余华成为海盐县第一个赴京改稿的作家,赢得了县领导的重视和赞誉。同一时期,《青春》杂志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《鸽子,鸽子》。余华如愿以偿,从卫生院调到文化馆。

社会新闻 促成小说

那段日子,余华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。他在杭州一家书店买到一本《卡夫卡小说选》,其中的《乡村医生》让他终生难忘,小说里写一匹马,卡夫卡不顾叙述逻辑,他想让那匹马出现,它就出现,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,那匹马就没有了。余华说:“我想要是这样写,我也能写,大师都能这样写,那我当然也可以写。”

他饱受退稿的折磨,收邮递员送来的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,也摸索出一套投稿方式——先寄给国家级的杂志,若被拒绝就转向省级,再次被拒绝则投向地区级杂志。“我的心态相当好,这家杂志退了稿,我就往另外一家杂志寄,所以我的作品最后基本都发了。”

余华回忆,当时的文学杂志编辑非常认真,认真地读自由来稿,不但有退稿,还有那种铅印或者油印的退稿单,开头写“余华同志”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文学杂志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,作者需要自己承担投稿费用,杂志社也不再退回来稿。很多杂志更倾向于向知名作者约稿,对自由投稿的关注度很低,新人更难成名了。他感慨:“我赶上了一个好年代,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如果晚两年开始写作,我可能就出不来了,现在还在医院拔牙呢。”

1986年,《北京文学》办笔会,希望余华带着稿子过去。带什么稿子呢?刚好他在一家地方晚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,浙江嵊州一辆运苹果的货车,半路被人抢了。当时这种事非常罕见,余华感到讶异,干脆就写抢苹果吧!他写出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“写作的过程非常愉快,只用半天就写完了,写到最后,我发现写作带着我走了。我要感谢卡夫卡,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,迄今为止,我还是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。”

虽然之前也有小说发表,但在余华看来,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才是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,是他的小说处女作。

他18岁时确实有过一次出门远行。“有个同学在学开卡车,他的师傅要去上海运货,我搭便车。我们到了上海郊区一个工厂仓库,提货完,就回来了,并没有进到市区,周边荒凉得还不如我们海盐的县城。”而在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,主人公最终找到了旅店。余华说:“那个小伙子心态还不错。”

1987年,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、文学批评家李陀把余华的两篇小说《四月三日事件》和《一九八六年》推荐给《收获》杂志。大概过了两三个月,余华收到《收获》杂志编辑肖元敏的信。“那封信很厚,收到时我想,如果是录用通知的

话,不至于那么厚。信里肖元敏告诉我,《四月三日事件》准备发在第五期,《一九八六年》准备发在第六期。因为《一九八六年》显得比较残忍,稍稍做了一点处理。她把那些最残忍的描写抄在信上,又附了她的删节版,问我是否同意。我心想,还有我同不同意的权利?我第一次感到,一个作者是有权利的。”

余华说:“写作是与灵感的斗争,你的坚持使灵感同情你、怜悯你并且来临。”那时,他还不擅长心理描写,威廉·福克纳的短篇小说《沃许》给了他启发。其中写到杀人者的心理,福克纳让杀人者的心脏停止跳动,让他睁开眼,接下来一大段描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,只写死者的血在地上流,周围是美国南方的景色和气氛。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《白象似的群山》,整个叙述就是两个人的对话,但他写的全是他们的内心。余华说:“优秀的心理描写都是不写心理,心理描写其实是被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,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”

写作随笔 训练思维

《活着》写出了那一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,写完后,余华觉得写得不够。有一天,他和妻子陈虹路过一条商业街,看到一个人,泪流满面地走过来,大庭广众之下,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悲伤。余华陷入思考,“这是一种怎样的悲伤?”那一瞬间,他的灵感之门被开启了,开始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也是因为那个人,才有了许三观因卖不出去血,在街上大哭的场景。

从文学技巧来说,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是完全用对话完成的小说。余华认为,对话不仅是人物的发言,还表达了作家对这个人物、对这个事件的一种洞察能力。必须写非常符合人物身份的话。“我完全放开,让人物去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可以这么说,在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时,前三分之一是我在为人物设计台词,凭我的感觉,判断他说的这句话对不对,是不是他的语气。到了中间的三分之一,我的写作和人物说话之间达成了默契。最后三分之一,已经是人物自己说话了。那种写作,那种境界,那种愉快的感觉,是对写作最好的酬劳。”余华说。

病学调研,当晚她便赶到空港院区,把生殖中心的规划草图画好送到负责人手上。所有的布局,临床诊区的流程怎么走,胚胎实验室怎么安排,取卵移植手术室在什么位置等,只有将来要在这里工作的人,才能考虑得最周全。那半年里,宋学茹每天上午在和空港院区看门诊,中午随便吃口饭,马上开车赶到空港院区,下午在现场监督施工,跟工程监理似的,虽然累,但很有干劲儿。

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降低孩子出生的缺陷

总医院建立生殖中心至今,综合诊疗水平不断提高,治疗的患者覆盖了国内二十几个省市、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,其中包括来津工作、学习、交流的外籍人士。某外企一法国夫妇,在法国做了几次助孕治疗,没成功,后来到了总医院就诊,仅一周治疗便成功怀孕,生下一对双胞胎,给医生们发来了两个宝宝的照片。那一刻宋学茹感慨:“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真的很重要,也为天津的发展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!”

目前,胚胎移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(三代试管婴儿)在我国处于科学前沿,宋学茹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,同产前诊断中心共同筹建,终于在2023年获得了国家审批,拥有了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服务资质。

三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的是有家族遗传病史或反复流产的患者,通过胚胎筛查来阻断遗传病。比如常见的21-三体,也就是唐氏综合征,携带这种异常染色体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,但智力存在缺陷,无法适应社会。产前诊断最早就是从筛查21-三

体开始的,如果出现染色体异常,便可以使用三代试管婴儿技术,选一个正常胚胎,将它移植进去,生下健康的孩子。宋学茹说,早期他们遇到过一位患者,前后生了三个孩子,都是七八天就夭折了。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诊断,很遗憾。现在有了基因检测及代谢组学检测,发现其有这位患者和丈夫都是一种罕见代谢病的致病基因携带者,子代有1/4发病的可能性,可以给她做三代试管婴儿,挑选不携带致病基因的正常胚胎进行移植,让她的孩子活下来。因此,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也是最先进的阻断遗传病的一种方式,大幅度降低了婴儿出生时的缺陷,不仅可以减轻很多家庭的压力,也为国家减轻了负担。

从获得国家审批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,宋学茹他们已经为近300对夫妇实施了PGT治疗,避免了反复流产对母体的损伤,实现了家族性遗传病的孕前阻断,真正达到了优生优育的目的。

医者仁心,把患者摆在首位 治疗前先帮他们解决心理问题

当家人和患者都需要宋学茹的时候,作为医生,她选择了照顾患者。1998年,长江、嫩江、松花江等河流域地区发生特大洪水。宋学茹刚下手术台就收到消息——医疗队马上出发去松花江。她报了名。当时她父亲半身不遂,卧床四年多,长了褥疮,正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。刚到灾区没多久,家里就给她打电话,说她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让她尽快回来。她想请假,可又一想,虽然洪水控制住了,但疫情防控还很难,能不掉队尽量还是别掉队。任务结束后,回到天津的第四天,父亲去世了。宋学茹说:“我没能陪在父亲身边,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。”

宋学茹说:“有时病人跟我说两句好听的,我就愈发对病人好,完全是发自内心的。”同事们常说她:“你看病怎么这么磨叽,跟病人说那么多话,你不会快点儿?”宋学茹回答:“我跟她们聊天,也是在给她们做治疗,我们这个领域可能会‘话到病除’。”的确有好多不孕症患者,怎么治疗怀不上,做试管婴儿也不行。宋学茹就说,咱调整调整,休息两三个月,等状态好了过来,再看看。结果等待的过程中,患者怀孕了。“这种例子很多,其实是心理问题。所以医生要替患者把握好,真正有需要的,再去做试管婴儿。”

曾有一位女患者,在别的医院做了两次试管婴儿,取了两次卵,却因胚胎移植后发生宫外孕切除了双侧输卵管。患者情绪低落,找到总医院生殖中心,想最后再尝试一次。宋学茹问她:“你丈夫来了吗?”她摇头说没有,又问宋学茹,能不能让她丈夫只来一次?因为反复做试管婴儿,不仅给他们造成了经济压力,对她丈夫的精神打击也比较大。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,整个人一点儿自信都没有了。宋学茹说:“那我就尽量想周全点儿,让你丈夫只来一次。”结果,她的试管婴儿做得很顺利,一次就怀孕了。做B超看到孩子有胎心,她终于踏实了,再跟医生说话时,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,而且每次随诊,丈夫都紧随身旁。她生下一对双胞胎,一家人一起来医院,丈夫满脸笑意。宋学茹说:“可见孩子对一个家庭、对夫妻关系的维系有多重要。”

宋学茹遇到过很多患者因生育问题造成心理障碍,甚至导致家庭破裂,因此,她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年轻医生说:“医者仁心,我们治疗的不仅仅是个体,也是在‘治疗’他们的家庭。医生要站在病人的角度想问题,他们的期盼是什么?困难在哪里?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去进行治疗,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”

讲述

在妇产科临床工作近40年,亲历试管婴儿技术走向成熟 每天都在迎接新生命的到来

本报记者 徐雪霏

宋学茹生于1963年,现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、国家卫生健康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查专家组成员。从1985年大学毕业至今,她从未离开过妇产科。本世纪初,她将精力集中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,见证了无数试管婴儿的诞生。她说:“生殖医学技术关乎每个不孕不育家庭的幸福,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,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。目前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,因此生殖医学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,有效保存生育力,我们也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。”

忆天津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健全人类辅助生殖服务体系

宋学茹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,1980年考入天津医学院(今天津医科大学)。那时同学们谈起各自的志向,有人说要当科学家,有人说要当学者、教授,宋学茹说,我有个好大夫就行了。同学问她,你这好大夫的标准是什么?她说,病人来医院看病,点名找我,我觉得这就是好大夫。

1985年,宋学茹参加毕业留校考试,在总医院接受面试。当时流行一



句话,“金眼科,银外科,叽里咕噜妇产科”,好像首选妇产科的人不是很多,但她想去:“我觉得妇产科既有内科的特点,又有外科的特点,既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,又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,对医生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一些,在治病救人的同时,每天都能迎接新生命的到来!”

妇产科焦书竹、张世伟二位主任欣然接纳了宋学茹,并向她对哪个专业更感兴趣,觉得妇产科还有哪些难题需要解决?宋学茹说:“我在门诊看到有些不孕症的患者,她们不仅被疾病困扰,还要承受精神压力,将来我想为她们做点事情。”

那时不孕症在妇产科并不算一个专业,只是门诊的一个病种,治疗方法

有限,输卵管不通的通通液、排卵不好的用点儿促排卵药,并没有特殊的治疗手段,剩下就要依靠中医治疗了。而国外医学界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探索已经开始。1978年,第一例体外受精-胚胎移植试管婴儿在英国降生,国内很多医学专家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。1988年,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诞生。随后,湖南、广东、重庆等地陆续诞生了试管婴儿。数年后,天津妇产科学界开始进行该技术的临床应用研究,总医院在时任院长只达石的大力推动下,组建队伍开始攻关,请国内外的专家来指导、授课,一步一步地边学边干,终于在1999年10月诞生了总医院第一例试管婴儿。

当时,试管婴儿技术包括体外受精-胚胎移植IVF(一代试管婴儿)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(二代试管婴儿),应用于临床尚处于早期,国家实行规范化管理,建立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准入制。宋学茹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从场地规划、技术完善、人员培训等全方面进行规范化建设,2006年获得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资质,总医院生殖医学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2015年,总医院扩建生殖中心,领导通知宋学茹的时候,她正带着研究生在静海区做有关生育力下降流行